

# 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与融合

苗壮,郑克岭

(东北石油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黑龙江 大庆 163318)

**摘要** 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肇始于古希腊时期的理性是承载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在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与社会的过程中相互作用。随着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两者出现了分裂与冲突,使得人类不断迷失自我,甚至异化为技术的、最终被货币主宰的物的附庸,从而形成了人类心灵与生存环境的双重困境。因此,只有坚持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相互融合,实现科学求真与伦理求善的内在统一,才能使人类社会真正走出现实困境,最终实现物质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和谐。

**关键词** 科学理性;价值理性;分裂;融合

**中图分类号** :B0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10)02-0025-04

## 一、理性的源起

理性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经典概念,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范畴。

面对一个被认为是上帝创造的世界,敬仰着多如繁星,主宰着人类命运方方面面的众多神灵,古希腊的先哲便开始了对宇宙自然奥秘的理性思考。他们所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透过众多神灵力量的表现形式,去探究其背后的自然原因,寻求不依赖于任何神秘力量的对世界统一性的理解和把握。从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始基”,到阿那克西美尼万物的本原是“气”,这是最早提出的关于世界本原的观点。这些观点构成西方思想脱离原始宗教神话走向理性思考的开端。他们用某一种或几种物质性的事物取代原始宗教神话中的超自然的最高主宰,构建了哲学关于世界本原的概念,这是人类认识的一次飞跃。“在人类的历史上,是希腊人第一次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理性自然观,而这正是科学精神最基本的因素。许多古老的民族,或者只有神话或宗教的自然观,或者缺乏对自然界的系统的看法。<sup>[1]</sup>希腊人将自然作为独立于人的东西加以整体看待,并把自然界看成是一个具有内在规律的对象,其中规律又是可以为人们把握的。同时,希腊人发展了复杂精致的数学工具,用以把握自然界的规律,这些都开启了科学精神的先河。

如果说科学精神源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中,那么人文精神就更为集中地体现在古希腊的神话和其早期的文学作品中。在荷马史诗和伊索寓言等古希腊著作里,我们可以发现希腊人对道德的思考,他们试图规范人们的生活和行为,并形成具有普适性的集体意识。“希腊科学从本质上说,走上人类学的道路,或者说走上了主体性的道路,研究人们的内心活动,研究人们的观念力和意志力;与此同时它也就丧失了它的纯理论品格,获得了占绝对优势的实践意义。<sup>[2]</sup>从智者运动开始,自然的观点与习俗和法律的观点得到区别,人的问题被提升为哲学的首要问题和核心问题,从而开启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先河。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sup>[3]</sup>”。这种观点把人和人的感觉看做是万物的尺度,实际上也就是把人放置到哲学思维的中心地位。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和“道德即知识”不仅体现了人文精神,而且还为这一精神加上了思辨理性的色彩。他把人的自我意识从一切传统的权威中解放出来,通过意识对自己做一种反省来认识自己,目的在于从自身发现人的本质。

由此可见,肇始于古希腊的理性是承载着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其中的科学精神是在对自然、本性合理性的追问过程中产生的;而人文精神则是在对风俗习惯、伦理规范以及对人的存在与价值进

收稿日期 2009-08-30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1542003)

作者简介 苗壮(1977—),男,黑龙江哈尔滨人,讲师,硕士,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行追问的过程中产生的。科学同人文的分离、冲突和对立,并不是从来就有的。相反,在人类早期的文化母体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完全是内在地融为一体的,是原始朴素统一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都是人类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理性的两翼,交互共生的。

由于这种融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传统理性正处于萌生状态,甚至本身还带有原始的神学色彩。到了中世纪,便遭受顽固而又强大的基督神学的沉重打击。于是,在漫长的中世纪,古希腊传统的理性之光被遮蔽了,人们的精神再一次陷入愚昧与迷信之中。

## 二、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

文艺复兴之后,伴随着人本精神的复兴和科学理性的崛起,宗教神学逐渐失去统治地位,人类社会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人类从早期对大自然的那种恐惧、盲从态度转变为积极、主动地向大自然出击,运用科学技术手段不断地征服与驾驭自然,从人对大自然的归属转变为人对自然的主宰,实现了人性从自然性向自由发展地巨大飞跃,科学理性也日益成为人类赖以超越自然的主要手段与途径。同时,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和谐发展的关系也开始瓦解。一方面,科学理性日渐脱离人的价值约束,变成新的统治人的“自然力量”。另一方面,人文主义者则极力维护价值理性的核心地位,并在很多方面漠视科学主义所提倡的方法,从而导致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进一步分离。这就使得完整的理性精神日益分裂为两极:一极是推崇价值理性,提倡人文关怀的人文主义;另一极是推崇科学理性,提倡逻辑和实验的科学主义。二者在文化理念和价值判断上经常处于相互对立的状态,其冲突也逐渐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表现出来。

### 1. 科学理性的泛化与价值理性的式微

科学理性是“人类认识世界、把握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种认识能力、思维能力和所持有的一种精神”<sup>[4]</sup>。科学理性作为人类的一种探究活动反映了人类在活动中的规范性和秩序性,从而为人类的活动提供了一种内在的约束力。启蒙运动在消解了上帝的神圣化形象、唤醒了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也确定了科学理性的崇高地位。人类的理性凭借科学去探求真理、发现自然界或现实世界的事实与规律、求得人类知识的增长。其直接的和基本的目标是理解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是解释自然而不是控制自然。然而,在西方工业革命时代,物理学方法的“无往不胜”使人们自认为能够凭借科学理性分解清楚并掌

握任何知识领域。科学理性不再保持其本真的形态,而是展现出了更广的功能,泛化为“功能性形态的理性”。正如巴雷特所言:“理性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所赢得的巨大胜利,暗示着它不可避免地要扩大到人类经验所有其他领域,以驱散古代迷信的阴云;它扩大到法律、社会风俗、政治和历史等领域。”“进步”的观念不仅被宣布为一个事实,而且也被宣布为一条历史规律。<sup>[5]</sup>从而,科学理性在其诞生之始的认识能力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功能性”的科学理性,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刚刚被启蒙运动开启出来的多元思维又被基本统一的思维方式所规定。“科学理性”被推上了统帅宇宙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法律、社会风俗、政治和历史等人文领域也被纳入其中。

相对于科学理性,价值理性在近代以来发展却明显滞后,这也是形成科学理性泛化的主要原因。所谓价值理性,是人们注重行为本身所能代表的价值,即是否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忠诚、荣誉等。它所关注的是从某些具有实质的、特定的价值理念的角度来看行为的合理性。价值理性关怀人性的世界,价值理性视野中的世界是一个人文的世界,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它不是在人之外的冰冷的客观实体,而是和人水乳交融的主客体混一的世界。价值世界是以“合目的性”的形式存在的意义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人对价值和意义的追问,人的最终归宿和终极关怀成为重心所在。科学理性的强化,价值理性的式微,使人的本性、情感和对自由的追求都被逐渐消解,人文精神在实证的科学精神面前黯淡无光,科学使人丧失了生活意义、失去了精神家园。“代表这个世界的精神态度已被称为实证主义。实证主义者不想高谈阔论,而是要求知识;不想沉思意义,而是要求灵活的行动;不是感情,而是客观性;不是研究神秘的作用力,而是要清晰地确定事实”<sup>[6]</sup>。缺少了人文精神,科学只能是盲目的、莽撞的,它无法解决自身存在的意义问题。如果一味地只强调程序化、功利化、规范化,而将道德理想、终极关怀、文化价值和人生意义等问题排除在外,那么其最终只会陷入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的泥潭。随着工业化文明对科学理性的强化,人的自由被一种追求效率和秩序的体制化了的社会机制所遏制。

### 2. 科学理性的物化与技术理性的张扬

技术是人类早期的具有实用性的实践活动,科学产生伊始是与技术相对独立的,且并不具有实用的性质。近代以来,技术开始获得了科学的灵魂,科学也逐渐发挥出了对技术的引导作用,人们知道了“怎样做”的同时也知道了“为什么这样做”。因此,

传统的经验型技术开始向科学理论型技术转变。在某种程度上,科学理论的发展是服务于技术工艺的需要,科学被实用化了。由于科学被实用化、物化,科学理性的突出特点也就从探求真理、寻找规律变为强调逻辑上合理、形式上完善、操作上可行。按照这种要求,在科学应用中,一方面将科学技术化、工具化,另一方面将事物过程形式化、逻辑化,从而使科学具有“可应用性”。科学理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异化为一种工具理性,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朝着技术化、工具化的方向演进。

今天的科学理性精神,并不是希腊人的那种以“自由”为宗旨的健全理性,而是以“效用”为目的的技术理性。技术理性在资本主义制度合理化过程中,无疑是科学理性思维方式的助推者和现实化的核心要素。随着科学的迅猛发展,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创造活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革,科学知识使人们掌握了物质运动的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丰硕的技术成果,人们意识到了以科学作为依据的技术才是能使功效最大化的技术。“在人类理性的推动下,当代技术的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他最终使技术的发展获得了可靠的理性基础。”<sup>[7]</sup>由此,科学理性彻底被技术理性的特征同化。“筹划”是技术理性的核心特征,通过“筹划”,自然界成为一种可以用技术手段预测、度量、计算和验证的集合体,“能否量化”、“能否实用”成为指导人们行动的首要思维方式。因此,由科学理性所引发的标准化、通用性和可重复性的技术逻辑开始影响人类复杂的理性思维,它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笼罩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之上,在这种力量的作用下,社会所有的组织都日益演化为技术化的组织,而技术理性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些社会组织的主要运作原则和统治方式。最终,自然界越来越脱离自在状态,而人却越来越被“技术化”了<sup>[8]</sup>。

### 三、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走向

推崇科学理性精神,使人类社会能够在遵循客观规律当中有序地向前发展,这是人类的理想。但必须指出的是,科学理性毕竟不是万能的,它始终是人处理外部世界的有限工具。不可否认,一方面科学理性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改善了人们的生存条件,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为人类经济目标的实现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思维方式将人“物化”,忽视了人的主动性和自我发展性,因而未能充分开发人的潜能,甚至使人异化为技术的附庸,使人失去自我,失去生活的原本目标,使人沉沦为商业化的、消费型的,甚至最终被货

而主宰的物的附庸。人们为达到目标而破坏环境,形成人类心灵与生存环境的双重困境。这主要是由于科学理性过分膨胀,价值理性相对暗淡,科学理性吞噬价值理性,使人对象化、客体化,人不再是主体而是客体,不再是目的而成为手段,最终打破了价值和科学间的二元平衡。

从人类理性的结构看,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人类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理性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价值理性是人类在改造社会和自身的过程中形成的,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是人在不同的社会实践领域表现出来的能力。人类改造外部世界是一个整体的过程,因而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必然渗透价值因素,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必然要利用科技的力量。不存在与价值无关的纯科学理性,也不存在背离科学的纯价值理性。”<sup>[9]</sup>因此,构建一种能够融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新理性主义已成为大势所趋。

#### 1. 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价值理性的弘扬提供现实基础

近代以来,科学的发展帮助人类破除迷信、摆脱蒙昧,把人类从宗教神学的禁锢下解脱出来,赋予人类乐观、自信、向上的生活基调,许久被压抑的人的主体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扬。人们依据科学理性来认识世界、发现客观世界的规律特征,从而改造客观世界达到造福人类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并不是限制人类、束缚人性的因素,而是发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使其更好地生存在客观世界的一个载体。科学与人文的交融在文艺复兴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这个时期,科学家们不仅崇尚科学理性,而且重视弘扬人性,他们在捍卫科学真理的同时,表现出了伟大的人格魅力。因此,文艺复兴时期是西方文明花园里的一朵奇葩,科学、人文在这一时期得到完美融合。

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技术工艺水平也得到了相应的进步,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和生产力水平。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类控制、改造自然的能力,从而不断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正是在物质需要不断被满足的基础上,文学、建筑等一系列艺术活动才有了长足发展的可能,人类才有精力去反思自己的生存状况,追问自身的生存价值。因此,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为人文精神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

#### 2. 人文精神为科学理性提供价值导向

众所周知,科学应该是立足于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其任务在于对真的追求,而不在于对善的颂扬。科学作为对事物整体结构必然联系的揭示,本身不

存在价值选择的可能性。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利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社会中有用的，但它也是能用来杀人的。”<sup>⑩</sup>科学理性是物的逻辑，而价值理性是人的逻辑。人的发展是人类存在的必然性，人的发展必须通过科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来实现，而科学体系的构建必须关注人的存在才具有合理性。现代社会所产生的各种生态危机、环境灾难、资源枯竭以及持续不断的冲突与纷争、层出不穷的新兴技术所带来的伦理困惑……正是由于科学背离了价值导向造成的。人类社会只有在价值理性的指导下，合理运用科学理性才会使科学与人的自由始终如一、同步、和谐发展。只有坚持人文精神的伦理规范和价值导向功能，人类才能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与自然融为一体，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

由此可见，只有坚持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实现科学求真与伦理求善的内在统一，才能使人类社会真正走出因科学技术发展而产生的困境，最终实现物质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和谐。

(上接第12页)传统文化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庞杂文化体系，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因此，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要进行选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积极回应实践发展要求，关注大众的现实生活，切实引起大众的情感共鸣，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才能真正使马克思主义信仰内在于大众的现实生命本身。

#### 参考文献：

[1] 马斯洛. 人的潜能与价值[M]. 林方,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344.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 郭沫若. 十批判书[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6: 88.

[4] 张岱年. 中国哲学大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261.

[5] 做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仰者: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陈学明[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6(12): 10-15.

[6] 胡锦涛. 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 在省部级主

#### 参考文献：

[1] 吴国盛. 科学的历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60.

[2] 文德尔班. 哲学史教程: 特别关于哲学问题和哲学概念的形成和发展: 上卷[M]. 罗达仁,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97.

[3] 罗素. 西方哲学史上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111.

[4] 黄健. 科学理性的人文反思[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2(10): 26-29.

[5] 威廉·巴雷特. 非理性的人[M]. 段德智,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124.

[6] 雅斯贝尔斯. 时代的精神状况[M]. 王德峰,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50.

[7] 王桂山. 技术理性的认识论研究[M]. 沈阳: 东北大学出版社, 2006: 93.

[8] 何继业. 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及伦理风险[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3): 149-152.

[9] 周兰珍. 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探析[J]. 江苏社会科学, 2007(6): 38-41.

[10]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文集: 第3卷[M]. 许良英,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56.

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05-06-27(1).

[7]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137.

[8] 黄明理, 赵政委, 戴锐. 论马克思主义的魅力与其大众化的内在逻辑[J].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11(3): 41-44.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7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405.

[10] 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 第10卷[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2984.

[11]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 第3卷[M]. 《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组, 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78: 337.

[1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303.

[1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12.

[14] 列宁. 列宁选集: 第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299.

[15] 荆学民. 社会转型与信仰重建[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 25.